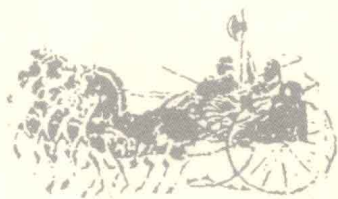


CHUNQIUSANZHUANYU
JINGXUEWENHUA

《春秋》三传与 经学文化

□方 铭 /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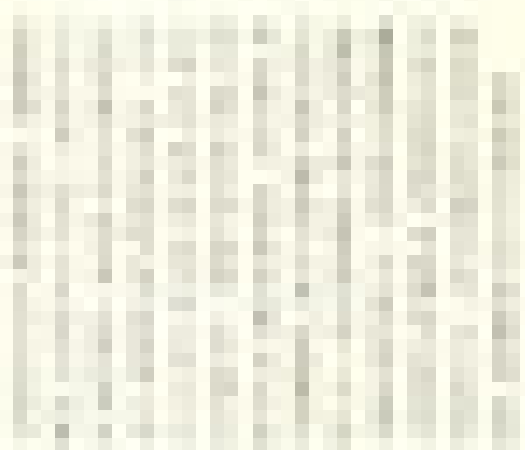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
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
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
《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
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
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
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
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
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
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
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長 春 出 版 社

《春秋》三传与
经学文化

陈其南 著



中华书局

CHUNQIUSANZHUANYU
JINGXUEWENHUA

《春秋》三传与 经学文化

□ 方 铭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方铭主编.—长春:长春出版社,1905.7

ISBN 978-7-5445-1196-4

I.春… II.方… III.①中国—古代史—春秋时代—编年体②春秋—研究—文集
IV.K225.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2295 号

《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

主 编:方 铭

责任编辑:谢冰玉

封面设计:王国擎

出版发行: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0431-88561180

邮购零售电话:0431-88561177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130061

网 址:www.cccbs.net

制 版:长春出版社美术设计制作中心

印 刷: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720 千字

印 张:35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431-87923413

前 言

孔子作《春秋》，见于《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而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春秋》不仅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为君、为臣、为父、为子者，也是必不可少的礼义教科书。

又《隋书·经籍志》云：“《春秋》者，鲁史策书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沦废，鲁以周公之故，遗制尚存。仲尼因其旧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顺，或直书其事，以示首恶。故有求名而亡，欲盖而彰，乱臣贼子，于是大惧。其所褒贬，不可具书，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说，左丘明恐失其真，乃为之传。遭秦灭学，口说尚存。汉初，有公羊、穀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初，齐人胡毋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海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故后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穀梁三家并立。汉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说》。而《左氏》汉初出于张苍之家，本无传者。至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为训诂，授赵人贯公。其后刘歆典校经籍，考而正之，欲立于学，诸儒莫应。至建武中，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时陈元最明《左传》，又上书

讼之。于是乃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遂罢。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永平中，能为《左氏》者，擢高第为讲郎。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穀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无师说。”孔子之后，解说《春秋》者甚众，而《公羊》、《穀梁》、《左传》都曾大行于世。虽然《公羊》、《穀梁》自隋以后影响渐弱，但是，即使在今天，与《左传》一样，仍然是我们通往孔子思想殿堂的必要门径，所以，自唐以后，不断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问世。

《汉书·司马迁传》所载司马迁《报任安书》、《史记·太史公自序》皆肯定为“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而《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类似的说法亦见于《后汉书·班彪传》所引班彪之言，班彪云：“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以《国语》出于左丘明，是与以《国语》为《春秋外传》的看法相联系的。王充《论衡·案书》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以《国语》为《春秋外传》，还可以找到证据。《汉书·韦贤传》云：“（刘）歆又以为礼去事有杀，故《春秋外传》曰：“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此处所引《春秋外传》之言，见于《国语·周语上》，而《汉书·律历志下》也以《国语》为《春秋外传》。《春秋》以鲁为内，以诸国为外，因而《国语》可以称为《春秋外传》。刘知幾《史通·六家》曰：“《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列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或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也正因此，研究《春秋》及三传，不能不把《国语》研究放在一起。

2009年8月16日至17日，由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国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大学文学院、国学网等单位共同主办，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古代散文学会、清华大学古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中心等单位协办的“2009年两岸四地《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来自两岸四地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七十余人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另外,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工作人员及青年研究者三十余人旁听了这次会议。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单周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谭家健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陈其泰教授等著名学者在开幕式上,做了主题发言。这本书,就是这次会议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的主要部分。

按照会议主办单位的构想,本应在本次会议召开前,先行出版会议论文集,但是,由于会议筹备的时间紧迫,在会议召开前,只来得及印发了一本会议论文集。而这次出版的这本书,比会议论文集的篇幅略少一点,是因为部分与会代表表示,他们的论文尚需要进一步润色,所以没有收入文集中。

今年秋天,我有机会结识长春出版社总编辑王占通先生、编辑谢冰玉女士,他们对学术研究的古道热肠,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使命感,让我感动。他们慨然应允出版这部大部头的学术文集,才能使这部书这么快面世。王占通先生是研究先秦史特别是先秦法律史的专家,他亲自审阅了本论文集,并仔细地指出了论文中的错漏,其敬业精神和深厚的学养,令我钦佩不已。谢冰玉女士对编辑工作极度负责,正是因为她的不断督促,我才能有信心与我的学生们一道来完成编辑这本书的工作。长春出版社正是有这样优秀的从业人员,才能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届全国出版行业评估中被评为一级出版社,被授予“全国百佳出版单位”称号。本书能在这么优秀的一家出版社出版,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本书的内容涉及《春秋》三传研究、孔子与《春秋》研究、三传与经学文化研究、《国语》研究四个议题,我们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把这些议题分为《春秋》三传与古代学术研究、《春秋》大义研究、《春秋》三传思想研究、《春秋》三传与相关文献研究、《春秋》文献研究、公羊学研究、《左传》文献研究、《左传》与《诗经》研究、《左传》叙事研究、《国语》相关问题研究、儒学价值与文化内蕴研究等共十一个板块,这个分类未必准确,只是为了便于读者顺利地把握各部分的中心内容而已。

《春秋》三传与《国语》是先秦重要的文献,近代以来,虽然海内外的学者对它们的研究倾注了大量精力,但是,高水平的学术研讨及交流,一直是比较少的。据我所知,似乎只有单周尧先生在香港举办过相关的学术会议。2008年4月19日至20日,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与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了“2008《春秋》《左传》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国大陆近60年来第一次召开有关《春秋》、《左传》的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孙禄怡教授主编的本次会议的论文集《〈春秋〉〈左传〉研究》一书,也由中华书局和中央广播电视

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夏天出版。这次会议的召开,为大陆学者搭建了一个《春秋》及《左传》研究与交流的学术平台,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因此,与会学者认为,有必要就《春秋》及《左传》的相关话题继续进行学术对话。

2008年冬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谭家健先生和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讲座教授单周尧先生倡议,在2009年召开一次包含有大陆及港澳台相关学者参加的、涵盖《春秋》三传及《国语》的学术研讨会,得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林庆彰先生等人的响应。谭家健先生希望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能承办这次会议,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很快得到北京语言大学有关领导的支持。

在会议筹备期间,始终得到了谭家健先生、单周尧先生的关怀和指导,并由我及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单周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蒋秋华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姚小鸥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新科教授、湖北大学文学院何新文教授、国学网总裁尹小林先生共同组成了筹备委员会。北京语言大学科研处、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及香港孔教学院汤恩佳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国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大学文学院、国学网等单位也为本次会议提供了经费等支持。

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王路江教授、校长崔希亮教授、副校长韩经太教授、科研处处长张维佳教授对这次会议的召开一直非常关心,王路江教授还亲自与会,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助理董立君先生、国际交流处处长陈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华学诚教授、人文学院党委书记程娟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助理兼中文系主任张德健教授、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的相关老师及博士、硕士研究生,对本次会议的召开,也给予了重要支持。

北京语言大学教师侯文华博士、张鹤博士、王孝强先生,博士研究生李敏、余霞、那仁格日勒等同学,在编辑、校对本论文集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没有他们的辛苦,我是没有能力完成这本书的编辑工作的。

方 铭

2009年12月6日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春秋》三传与古代学术研究	1
《左传》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李学勤	1
《左传》、《国语》易筮言“八”解/廖名春	6
《左氏春秋》“史”、“传”考辨/杨树增	14
《春秋》与“王道”:先秦学术观念的基本考察/邓国光	29
《春秋》三传之“诸夏”与后世“汉族”的断裂/吴 锐	35
《春秋》大义研究	47
公羊三世学说与孔子的政治智慧/方 铭	47
孔子《春秋》及其“《春秋》大义”辩正/姚曼波	61
春秋决狱论/马作武 马腾	80
《左传》灾异现象刍议/侯文华	93
《春秋》三传思想研究	105
《左传》美学思想札记/谭家健	105
试论《春秋公羊传》的“贤贤”思想/何新文	116
《左传》与《周易》的哲学化/刘丽文	127
论《左传》中的人性论思想/朱金发	138
《春秋》三传义理通贯说/耿纪平	143
《春秋》三传与相关文献研究	149
《史记》三家注称引《左传》《国语》考校/赵生群	149
《左传》“君子曰”与儒家君子之学/葛志毅	163
从《左传》看《仪礼》的成书及其反映的时代/许子滨	174
今古文之争及《左传》与《史记》的关系/罗军凤	219
《春秋事语》与《春秋》三传/牟 颖	227
《春秋》文献研究	235
《春秋》《左传》关系探论/王世舜	235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初探/冯晓庭	252
王夫之《春秋稗疏》研究/招祥麒	278
方宗诚《春秋传正谊》析论/蒋秋华	295
北宋《春秋》文献概述/贾贵荣	302

公羊学研究	305
春秋公羊学说独具的经学品格/陈其泰	305
论《公羊传》的历史褒贬及其文化渐进观/程水金	314
周拱辰《公羊墨史》初探/蔡长林	325
《左传》文献研究	335
《左传》“摄官承乏”解/姚小鸥 王克家	335
《春秋左传读叙录》的评价问题/单周尧	340
吕祖谦《左传》学述要/黄灵庚	360
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车子鉏商”释义商榷/潘汉芳	374
姜炳璋《读左补义》取义研究/李卫军	377
刘师培的《左传》“义例”观/王孝强	393
《左传》与《诗经》研究	401
《左传》行人辞令赋诗取义类型考论/郭丹 周晶纯	401
从《左传》用诗看周代礼乐制度的嬗变/郝明朝	409
《左传》赋诗与《韩诗外传》解诗说/于淑娟	416
《孔子诗论》与《鲁诗》考论/张 强	423
《左传》叙事研究	433
《左传》叙事文的艺术结构/张新科	433
关于《〈左氏春秋〉文系年注析》若干问题的思考/邵炳军 梅军	442
论《左传》的性质及其对古代散文研究理论建构的意义/张树国	458
《左传》叙事艺术新探/刘谦功	469
郑庄公的叙写与《左传》文学价值/周秉高	478
从“郑伯克段于鄆”看郑庄公形象/夏继先	486
《国语》相关问题研究	491
《国语》版本源流及公序本系统二子本之对比/俞志慧	491
“春秋笔法”与《国语》书写/叶修成	498
《国语》《左传》比较略论/张 鹤	505
试论《国语》的篇章结构/李 佳	513
儒学价值及其文化内蕴研究	527
《春秋繁露》中的神学思想与汉代行政理论/黄震云	527
刘歆的学术倾向与西汉末的复古及革新/唐 元	531
论《左传》中齐鲁两国女性的风貌及其文化内蕴/彭安湘	540
孔子反对厚葬颜回的原因/周 洪	546

《左传》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

李学勤

今天很荣幸有机会在这里说一点我个人的几点陋见，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我今天在这说的有三个问题，总的题目我想叫做《〈左传〉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

谈这样一个问题以前，我首先说一点题外话，最近中国先秦史学会开过几次会，我们在会上会下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术界常常把“古代”这个词定义太长了。很长一段时期大家觉得“近代”以前就是“古代”，可是最近这些年出了个新的事情，就是大家把“近代”的上限往下移了。过去我们一般人认为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算“近代”，这样还好一点，可是现在很多的近代史学者把“近代”的期限移到辛亥革命了，那么，辛亥革命以前就都是“古代”了，所以我们离这个“古代”当然也不太远了。这样长的“古代”，在全世界是没有的，这个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是觉得“古代”，或者“古史”，就是上古史，主要讲的是秦以前的时代的历史。

我想大家都知道在世界上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不只是中国一个，这些国家他的上古史都只能依靠一些比较晚的历史著作，作为基本的依据，才能建立上古史的系统。比方说古代埃及的历史，大家常常把它分为几个大的时期：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一共有31个王朝。这依靠的是公元前三世纪一个埃及僧侣叫曼涅托，他的书《埃及史》^①里面把古代埃及历史做了个系统的叙述，以这个系统作为基础。这部书早就散佚了，就和许多中国古书一样，只有辑本。同样，关于西方古典世界的历史主要依靠希罗多德的《历史》。^②

那么在中国，我们怎么建立起古史的系统？我们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作为背

^①曼涅托 Manetho（活动时期公元前四世纪末—公元前三世纪初），古埃及祭司和历史学家，用希腊文写成《埃及史》一书，该书有片段为教会历史学家保存下来，成为今人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史料。

^②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年—42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历史之父”，他生活于古希腊两次重要战争即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其所著《历史》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与其说它是一部战争史，不如说它是一部当时希腊人所知世界范围的历史。他试图以历史自身去说明历史，这在当时希腊历史思想上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景的系统是怎么建立的？当然，说来很简单，我们主要依靠《二十四史》里面第一部司马迁的《史记》。而《史记》在古史方面是依靠什么？因为《史记》比较晚，比曼涅托晚了差不多二百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怎么建立的古史系统？这点我可以向大家报告，“文革”时我曾做过一点工作，就是读《史记》，查查《史记》里面秦代以前部分它的来源是什么，根据是什么，总的印象就是《史记》除了依靠《诗经》、《书经》、《世本》以外，最主要的依靠是《左传》。

我在这里向大家贡献的一点意见就是《左传》是《史记》建立古史系统的主要依据。当然，司马迁看了许多东西，有的是我们看不到的。可是最主要的依据应该是《左传》。所以说，《左传》是我们建立古史系统的一个主要依据。

我们依靠什么，这个问题在考古学、历史学工作中常常会碰到。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前些年的时候，河南的浙川下寺一号墓，发现了大鼎上有长篇铭文，铭文的器主“王子午”，又称“令尹子庚”，是谁呢？我们哪里去找这个“王子午”、“令尹子庚”呢？实际上古书里有“王子午”，即“令尹子庚”的只有《左传》。如果你不相信《左传》，不用《左传》，就没法研究。还有一个例子，1973年，湖北当阳季家湖出土了一件铜钟，这个钟上的铭文一直讲不明白。因为这个铭文不全，它说：“王卑命竞平王之定救秦戎”，竞争的“竞”，平安的“平”，安定的“定”。不知道多少学者写文章讲这个，仍不能懂。前年在澳门有一批流散的青铜器，这批东西现在已经到香港，我个人是在香港看到的，上面就有完整地铭文。什么叫做“竞平王之定”，或者说是“竞之定”，这个词不懂，其实解决这个问题依靠的就是《左传》，因为《左传》里楚国的一些人名就是这个样子，他的“什么之什么”，不是像晋人介之推，前面是地名。这里的前面是父亲，所以“竞平王之定”就是“景平王之定”。景平王是楚平王，就是伍子胥鞭尸的那个楚平王。“竞平王之定”就是楚平王的儿子名字叫“定”。

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左传》，我们永远没法解释，所以说《左传》是我们研究古代的历史文化，包括古代的经典的的重要基础。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史记》所讲的历史从哪里来？除了《诗》、《书》，就是《左传》。当然，我说的《左传》也包括《国语》在内。《左传》当然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的历史，可是它讲的绝对不限于这段历史，实际也涉及了从古史传说一直到夏商周三代各方面的历史。这方面的历史如果今天没有《左传》，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整理清楚，所以我们对古代历史文化的依靠就是《左传》，包括《国语》。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一点。

下面我说第二点：刚才说了，如果没有《左传》，那么我们很难有清晰的、准确的对古代历史的研究。当然，有很多人不同意。大家都知道，从汉代，特别是公羊学者何休，他是公羊学的重要代表，是反对《左传》的，可是，大家知道正如前代学者所说的，何休或者是其他《公羊》或《穀梁》的学者，他们反对《左传》，并不是说《左传》这部书是不可信的，只是说《左传》这部书不能代表孔子的“春秋大义”，要找“春秋大义”的话，要找《公羊》、《穀梁》。我个人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点，今天还必须承认，因为《公羊》、《穀梁》的研究肯定会提供我们对于儒家很多重要观点的认识，这点可能是《左传》反而做不到的。后来，从清代的常州学派，从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以下，一直到康有为、崔适，他们对《左传》都有所怀疑，说《左

传》是经过刘歆的篡改。不过他们的观点，正如有些学者指出过的，并不是说《左传》里面讲的历史不可信，他们没有这个思想。他们只是认为《左传》这部书不是《春秋》经的传，而是割裂《国语》而成，这是他们的基本观点。

对于《左传》从历史真实性方面怀疑，说《左传》不足据的是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他1936年写了一部书叫《〈左传〉之思想史研究》。我建议大家多研究学术史，要很好地看一看津田左右吉这本书，他通过他的论证认为《左传》从历史上是不足据的，这个观点是前所未有的。

有两位学者对康有为、崔适以至津田左右吉的著作进行研究，作出了批评。我认为这对于《左传》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成果。

第一位是钱穆先生。钱宾四先生在1929年完成了一部书，就是《刘向歆父子年谱》。这是名著了，现在不但是在台湾有很多版本，内地方面也是在不断地在翻印。可是，读这本书一定要从学术史方面来看，为什么有这部书，这部书的目的是什么？它就是针对康有为、崔适的论点进行讨论。这部书的出现在钱先生的一生历史里起着关键作用，因为这部书首先是给顾颉刚先生看过，而顾颉刚先生在很多方面是继承康、崔的，可顾先生他的气度过人。在顾颉刚先生的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我还特别提到这件事，因为他的子女保存下来的钱先生的原稿现在还存在。大家可以看到原稿的题目叫《刘向、刘歆、王莽年谱》，顾先生给他改为《刘向歆父子年谱》，这点就好得多。而且是顾先生把这篇稿子发表在他当时主持编辑的《燕京学报》上，正因为如此，顾颉刚先生后来推荐钱穆先生到燕大当了教授，这是钱穆先生第一次跨进大学之门了。所以顾先生的大度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

可是实际上，在《刘向歆父子年谱》出版之后，康有为、崔适所谈的那些问题基本上都已经解决了。因为有关的论证已经非常清楚了，在座的学者只要认真读一下钱穆先生的这部书，他举的28个例子，便会看出过去怀疑的论点均不足据。我想这是没有办法反驳的。

第二个重要贡献比这个要晚，正好是针对津田左右吉的。1936年津田左右吉的《〈左传〉之思想史研究》出版是在日本东京，当时在那里有一位北大毕业的学者罗倬汉先生。上一次我在中央电视大学的那次会议上也提到过，不过那时我介绍的不够详细。罗倬汉先生在看津田的书之后，就认为这书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所以他就立志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这本书是在三十年代末，就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写的，当时没有能够出版。到了1941年以后，罗先生在重庆，有几位先生看过他这个书。一个就是顾颉刚先生，一个是钱穆先生，刚才我们提到了，他们都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在1943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本书，印数也是极少的。这部书的纸叫“粉报纸”，我不知道这种东西怎么能叫做“粉”或者“报纸”，可是在当时抗战的情况下，这已经是很不差的了。这本书只有这一个版本，我藏的这本是珍本，是一定要保存的。

在这本书里面，钱穆先生写了序，顾颉刚先生写了封信，这些对于我们《左传》的研究都是很重要，值得特别推荐介绍。钱穆先生序里面有一段话，我想在这里念一下。这段话作于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的秋天，下面写着钱穆写于成都北郊。他说了这本书怎么怎么的好，主要的特点就是通过《史记》内容的分析证明了

一个问题，就是司马迁当时看到的《左传》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左传》的本子基本上相同，包括其中解经的部分，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与各个《世家》里都有，可见司马迁看到的《左传》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左传》，并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刘歆割裂《国语》或者是伪造这些东西的说法统统烟消云散。书中有明确的证据，证据不是一条两条，而是有几百条之多，是整本书。而且他也分析了，哪些《史记》全据《左传》，哪些《史记》采的是其他的说法，很客观，都一条一条摆出来了。这是前辈学者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很重要的成果。钱穆先生在序里说了一段话，他说：“考证之业有新创，有旧守。”考证的工作，有的目的在于创新，有的目的在于保守。他说如果你拿着罗倬汉这本书给现在的学者看，一定有的会不高兴，也有的会惊奇，也有的会赞扬，可是，如果你找一个古人来看，不用说更早的，就是一个清朝中叶的学者，你跟他讲太史公的《十二诸侯年表》是根据《左传》的，我已经把它搞清楚了，那些人听了以后会觉得没有意义，因为这是人人知道的事情，用不着讨论，甚至有人听了这话就要睡觉去了，根本就不会理他。钱先生又说，再过了几十年之后，风气已经过去，所有人都知道《左传》是真书，《史记》是根据《左传》的，那些异说也就不存在了。再看罗倬汉的书，就同样觉得没意义了。钱先生说罗倬汉先生是喜好哲学的，他把这个道理与罗倬汉讨论，罗先生就特别叹息，说我做这个工作干什么呢？

我想，钱先生写这篇序的时间是1941年，到现在已经过了68年，几十年已经过去，今天我们来讨论《左传》与《国语》，当然仍会有不同看法，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问罗倬汉先生写这部书干什么？钱先生的预言已经真的实现了。这是我今天谈的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今天谈《春秋》经传，特别谈到《左传》，在座的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对《左传》研究最有贡献的是杜预。尽管清代的一些著作，一直到沈钦韩、刘文淇等，站在汉学家的立场上，他们力复古注，认为杜预注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春秋经传集解》等书有如何如何的错误。可是，我们平心而论，对于《左传》贡献最大的还是杜预。

我们人人都读杜预注，这个我想是没有疑问的。大家知道《春秋经传集解》有一篇后序，后序里杜预说的一段话，大家都知道，我在这里重复一下。他说晋武帝元年三月，他平吴，从江陵回到襄阳，“解甲休兵”，有闲工夫了，依照夙愿，去撰写《春秋释例》和《春秋经传集解》，恰好在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有人挖墓，“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他讲的是著名的汲冢竹书的发现，现在我们推断最合理的发现时间应该是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杜预看了这个新发现，其内容，他谈到有《竹书纪年》，“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他是《左传》专家，他就把发现的材料与《左传》对比，他就发现多数是相同的。如果说《左传》与其他二传有不同的地方，新材料每每是近于《左传》，而异于《公羊》、《穀梁》，所以他说：“参而穷之，可以端正学者。”杜预从他的研究出发，读了当时新出土的《纪年》，加以比较，证明了《左传》的正确性。这是王国维先生1925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的先声，所以王先生在讲“二重证据法”时引用了这件史事。

我今天向大家报告的是,我们有幸遇到了同样的机会。大家知道在去年七月,清华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竹简,这批竹简经过点数,共计有二千三百八十八枚,这当然包括残片。我们估计原有的整简不会少于一千七百支。这个还是很保守的。这里边包含一部史书,体例特别像《竹书纪年》,可是不像《纪年》从夏商周开始,它是从西周初年开始,一直讲到战国初年,这些材料我们正在尽可能地保护整理,会及时地公布整理报告,供大家来研究。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和杜预一样,来看一看战国时代的这部史书,和《春秋》经传究竟有什么不同。我在刷洗的过程中看过一部分,看起来对于《左传》的研究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我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大家,谢谢!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左传》、《国语》易筮言“八”解

廖名春

《左传》、《国语》中涉及《周易》的记载共二十二条，^①其中有三条“向无人能说其究竟也”，^②最为难解。它们是《左传·襄公九年》所云“遇《艮》之八”、《国语·晋语四》所云“得贞《屯》悔《豫》，皆八也”及“得《泰》之八”。此三条《易》筮之辞，难就难在“八”字的解释上。今拟在前贤今人诸说的基础上试为探讨，敬请批评。

一、“遇《艮》之八”“是谓《艮》之《随》”解

《左传·襄公九年》有一段易学史上艳称的记载：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媿，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杜预(222—284)《注》：

《周礼》：“大卜掌三《易》。”然则杂用《连山》、《归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为占，故言“遇《艮》之八”。^③

“《周易》之爻，唯有九、六”，“此筮乃言‘遇《艮》之八’”，杜预根据《周礼》“大卜掌三《易》”之说，遂推定其为“以七、八为占”的《连山》、《归藏》二《易》。孔颖达(574—648)疏肯定杜注，续加发挥：“《周易》以变为占，占九、六之爻，传之诸筮皆是占变爻也。其《连山》、《归藏》以不变为占，占七、八之爻。”尽管还有怀疑，也只是怀疑“二《易》俱占七、八，亦不知此筮为用《连山》，为用《归藏》”，在《连山》、《归藏》之间取舍不定而已。^④

杜《注》影响虽大，但唐人刘禹锡(772—842)却有“非臻极之理也”的批评^⑤，明人杨慎(1488—1559)也有“今之筮法，自有九、六，自有七、八，何必远言《连山》、

①高亨：《周易杂论》，齐鲁书社，1978年，第73页。

②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0页。

③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繁体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97页。

④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繁体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97页。

⑤刘禹锡：《辩《易》九、六论》，《刘禹锡集》，卞孝萱校订，中华书局，1990年，第87页。

《归藏》乎”的责难。^①今人杨伯峻(1909—1992)更说：“考《左传》言‘八’者仅此一见，《国语》言‘八’者亦仅二见，皆以不变之爻言之。下文解卦，仍以《周易》解之，则杜注未必可信。”^②

从《左传》下文“是谓《艮》䷳之《随》䷐”来看，这些批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是谓《艮》䷳之《随》䷐”之“是”即“此”，指代上文“《艮》䷳之八”。“《艮》䷳之八”即“《艮》䷳之《随》䷐”。下文穆姜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是”即此，指代的是“《艮》䷳之《随》䷐”中的“《随》䷐”。穆姜既然用《周易·随》卦的卦辞指称“《艮》䷳之《随》䷐”中的“《随》䷐”，那么，“《艮》䷳之八”，也就是“《艮》䷳之《随》䷐”，无疑属于《周易》。杜预说：“史疑古《易》遇八为，故更以《周易》占变爻，得《随》卦而论之。”^③谓先是得“古《易》”即《连山》、《归藏》以为“不利”，“史”再改以《周易》，以《周易》的《随》卦为解。这一释读，否定了“《艮》䷳之八”与“《艮》䷳之《随》䷐”的同位关系，显然是不可信的。

“《艮》䷳之八”既属于《周易》之系统，又当如何解释？后人有种种不同的意见。刘禹锡说：

且夫筮为干者，常遇七，斯干矣；常遇九，斯得坤矣。筮为坤者，常遇八，斯坤矣；常遇六，斯得干矣。……夫《艮》艮下艮上之《随》震下兑上，唯二不动，斯遇八也。余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为卦主，变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史以为东宫实幽也，遇此为不利。故从变爻而占，苟以说于姜也。何则？卦以少为主。若定者五而变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观之否”、“师之临”类是也。变与定均，即决以内外。今变者五，定者一，宜从少占，惧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谓《艮》之《随》”。“是谓”之云者，苟以说也。故穆姜终死于东宫，与艮会耳。^④

这是说“八”为不变之爻，“《艮》䷳之八”当为“《艮》之六二”。根据“卦以少为主”的原则，当以本卦《艮》之六二爻辞“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为断。而“史以为”“不利”，为了取悦穆姜，竟违反原则，以之卦《随》的卦名“随”为说，以为“随”义为“出”，穆姜会很快从幽禁的“东宫”中出来。

但是这一解释从上下文来看，很难说通。

首先，应该承认，穆姜对“史”以之卦《随》为说，并没有异议。也就是说，对于“遇《艮》䷳之八”，穆姜并不认为要取本卦《艮》之六二爻辞为断，她也认可了取之卦《随》为解的做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之卦《随》，他们并没有取其六爻的爻辞，都是以卦辞为释。不同的是，一是简单地取之卦卦名“随”为说；一是认为卦辞并不是决定性的，“吉凶由人”，人的品德是第一位的，没有好的品德，再好的卦辞也没有用。由此可见，穆姜否定的是《周易》的占筮作用，并没有说“遇《艮》䷳之八”“是谓《艮》䷳之《随》䷐”的解释错了。因此，刘禹锡否定“《艮》䷳之八”即“是谓《艮》䷳之《随》

① 吴静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3页。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964页。

③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繁体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97—998页。

④ 刘禹锡：《辩〈易〉九、六论》，《刘禹锡集》，卞孝萱校订，中华书局，1990年，第87页。